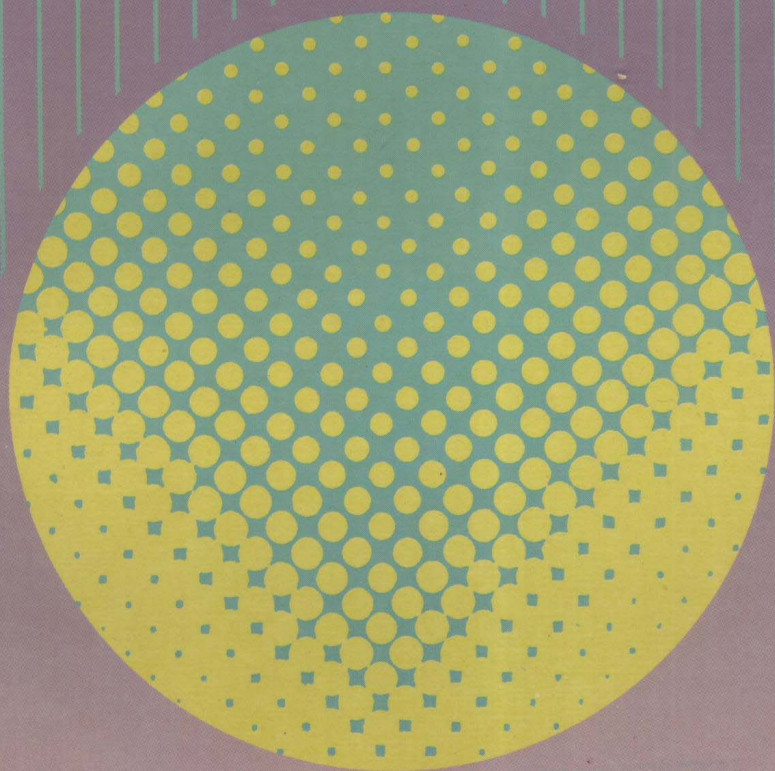


广东投资探索



广东省投资学会
省建设银行投资研究所

广东投资探索



广东省投资学会
省建设银行投资研究所

编

广东投资探索
广东省投资学会
广东省建设银行投资研究所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花城印刷厂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85804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18—00709—0/F·110

定价3.00元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 经济改革与投资 •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体制模式的选择·····	吴敬琏 (5)
改革过渡论·····	王 琢 (9)
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	黑爱堂 (22)
出路在于改革·····	张元元 (31)

• 投资体制 •

研究固定资产存量,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邱长云 (39)
广东投资管理体制改革10年回顾·····	王 涛 (42)
广东投资体制改革的回顾和今后思路·····	邓志强 (62)
广东电力投资改革评价及构思·····	谭建生 (76)

• 投资规模 •

广东适度投资规模研究···	温宝光 余佩 吴慧强 (91)
广东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监控初论·····	吴清泉 (103)

• 投资结构 •

调整投资结构 促进经济发展·····	田椿生 (111)
广东产业结构调整与投资对策研究·····	吴慧强 (122)

浅谈10年改革广东投资结构的利弊

和对策.....陈增华 (144)

• 投资效益 •

广东10年投资效益状况及提高投资

效益的对策.....广东省投资学会课题组 (155)

• 特区投资 •

关于特区投资对策问题.....梁文森 (175)

特区投资实践与探索.....广东省投资学会课题组 (180)

经济特区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李兆永 (202)

• 股份经济与证券市场 •

试论以发行外汇股票形式吸引外资.....黄炎田 (211)

对股份制的两点看法.....姚 迈 (217)

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制调查.....姚迈等 (221)

广东省证券市场的回顾和展望.....郁文达 (246)

编 者 的 话

投资作为一项具有奠基意义的经济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解放以来，我国在各行各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取向、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合理配置等的判别和掌握，以及投资效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长期困扰着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进行了大胆改革和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喜人的成绩，呈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亟待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

广东省投资学会自1988年成立后，致力于我省投资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1990年，为了全面而又更系统地展开这些研究，学会组织了包括有关院校、省计委、省统计局、省审计局等有关同志和建设银行在内的会员，对广东10年改革和发展中的投资进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

大家在广泛搜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地撰写了一批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1990年12月，学会在广州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会上，文章作者和会员代表就广东10年投资改革的成效、问题以及今后完善改革的设想和展望，敞开思想，广泛交流，展开热烈讨论。同时，应邀到会指导的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兼中国投资学会会长周道炯，省政府秘书长邱长云及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建设银行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我国经济学界著名学者专家吴敬琏、吴爱堂、王琢、田桥生、张元元、梁文森等同志，在会上就广东投资问题

和当前经济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为了荟集我省10年投资改革及其研究成果和专家们的真知灼见，会后，我们征得学者专家同意将他们的讲话整理成文，并从提交研讨会文章中选出部分质量较高的文章汇编成这个集子。我们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本集子得到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参考，比较系统地了解广东10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效益、股份集资、特区投资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和体制改革的进展及问题，从文章作者的展望和设想中，得到进一步改革的启迪，并借此推进我省投资理论和实践的研讨活动。

投资是一门科学，是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涉及面广而又十分复杂的子系统。其改革必须服从全国经济的大框架设计要求，运行受到其他系统的制约。因此，投资体制改革及其一系列参数判断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广东省投资学会两年多来所组织进行的探索仅是一个开端。限于掌握的资料、素材和认识研究水平，本集所选文章中论据不够充足，观点不够成熟依稀可见；由于编辑时间仓促，错误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鉴谅并指正。

广东省投资学会
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投资研究所

1991年3月

经济改革与投资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体制模式的选择

吴敬琏

1990年上半年，我国正在讨论如何克服“市场疲软”，走出困境的问题，我带着这个问题，在苏南地区跑了一圈，又跑了广东的几个县市。在这两个地方，我都同地方领导同志和企业家作过交谈。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虽然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历了10年认真的改革，改革带来了经济活力，也为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拿苏南来说，在过去的1年中，垮掉了10多万个农村企业，但是经济的整体能力、竞争能力更强了。经过整编，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达到了20%多，而且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广东的困难也不小，但它的外向型经济的活力比苏南还要强。

总之，我们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转折中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10年改革使我们的生产能力，企业的活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仍然是很大的。

如何凭借10年改革建立起来的基础渡过困难？目前大多数经济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经济困难的深层原因是结构不好、效益不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主要问题不在增量结构，而在存量结构，言外之意是投资管理部门无能为力。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很全面。因为存量结构不好的原因，是过去的增量（投资）结构不良造成的。所以，投资体制、投资运行规则是否合理，对于我们今后的结构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进一步说，把增量、存量截然划开本身就

是传统体制造成的，是旧体制僵化性的一种表现。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一般的规律是投资下去后，“钱到地头死”，不再可能流动和重组。这种把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泾渭分明，各不相犯的做法，只在旧体制下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流动性很强，很难作这样的划分。而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一方面费力进行调整，改变不合理的结构，另一方面又在继续生产不良结构。例如过去几年一直在刮，至今仍未停止的各种铺摊子的“风”。过去的彩电风、电冰箱风、易拉罐风、西装风等等成了今日调整的包袱，可我们至今还没有想出办法制止新的“风”，如乙烯风、轿车风，这就使调整永无尽头。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小的政策我们需要改善，更重要的则是大的体制到底如何搞才能使结构的优化是正调节而不是逆调节？现在现成的有四种体制模式，我们能否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体制呢？

第一种，市场自发调节模式。这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一条经典式的道路。经济发展从轻工业开始，赚钱后把资金积累起来再搞重化工业、基础工业。政府起的作用很小，投资自发性大。这样整个工业化拖了几百年。

第二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的僵化模式。企业资金全部收归国家，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严格划开，国家集中投资，强制积累。在外延式增长阶段，这种做法似乎有用。国家要发展什么，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如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工业体系。但它致命的弱点是，投资率很高而投资效率太低。高储蓄率的优势没发挥出来，增量资本产出率比别人高一倍，2元钱当别人1元钱用，出现很大的浪费。

第三种，亚太模式（东亚模式或亚洲模式），它是在市场协调的基础上，有强有力行政指导和政府干预。它的整个基础是市场，每个企业是根据预期盈利来进行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政

府在这个基础上对基础设施、重化工业和潜在比较优势作政策倾斜。象南朝鲜70年代搞基础工业设施建设，钱是企业的，但得由政府决定让不让你上。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发放低息贷款来发展电子工业，但它只拨发给部门，由各企业在竞争的基础上取得这种优惠贷款。只要是评上前十名的出口企业商社，政府给予负利率贷款，使之锦上添花。但是，如果在国际市场上失败，所有的优惠都收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目前新的“四小龙”，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大体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

第四种，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计划总的框架下面，引进市场因素，对投资决策权给予某些物质刺激。这是我国现阶段正在实行的模式。它有一定的优点或好处。从微观上看，投资活力、投资效益是比较好的。但从宏观上看，从国民经济结构来看则有问题。一是投资决策权仍在地方行政部门手里，而地方却很难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结果是全国各地到处都上项目，盲目的重复建设很严重。如在广东、苏南等地，我们花了很多投资，建了很先进的纺织厂、烟厂，但它们都开工不足，因为没有棉花，没有烟叶，没有蚕茧。如果让它们充分发挥生产能力，效益将是很大的，对国家、地方、企业来说都有很大好处。但是，现在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方面设备先进、效率很高的烟厂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烤烟生产等外烟，要搭配，强制推销，成本很高，质量很差。棉纺、毛纺、家用电器等等行业，无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总之，现在结构上之所以调不动，首先是因为在当前的行政性分权的体制下，每一个地方的行政当局决定其投资方向，而且只能从地区的利益出发，很难从整个国家的效益出发来衡量其得当与否。另一个原因是价格，既然引进市场导向或利润导向，企业就会把投资盈利高的产业或产品搞上去。但现在我们的价格没有放开，价格信号扭曲

得很严重，其导向自然就会不正确。暨南大学有一位同志的文章还提出，每一种新产品的消费时序结构是菱形的，价格应该跟着走，在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时，产量很少，价格应该很高，然后迅速降价，稳定一段，到了衰退期，再大幅度降价；而现实中由行政部门规定固定价格，结果在初期，价格偏低，大家都买，引致一种排浪式消费，各地便大量投资，把生产能力搞得很大；成本剧降，却又不能降价，结果产品马上过剩，导致大量的投资浪费。10年来，始于自行车，直到最近的乙烯、小轿车等各种投资浪潮已有几十次。在我看来，这种投资体制模式存在根本性的毛病。如何把它理顺，这是全国的经济学家都在苦心焦思的问题。选择是否正确，将决定我们能否解决当前国民经济碰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能找到路子，那么很快就可以走出困境。这与苏联东欧的情况不同。否则，我们仍将重复过去10年三次大调整的路子，重复“扩张——紧缩”的循环。我认为，由于国民经济深层的问题即结构优化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导致上述波动循环不但不断重复，而且周期越来越短，波幅越来越大。最近这次膨胀和衰退比过去哪一次都要厉害。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座的都是专家，我希望同志们能够集思广益，在10年改革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为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现在国际上对泰国刮目相看，它1年引进外资300多亿美元，而我们10年才引进外资400多亿美元。但是象广东、苏南等地区与起飞前夕的国家如泰国等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我们中国人至少不比外国人笨，我们不要妄自菲薄。10改革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好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我们的进一步努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研究中心）

改革过渡论

王 琢

一、改革过渡阶段的目标模式

我提出改革过渡论，是从中国是个大国出发，从中国又是个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出发。这样的大国推进改革，绝无可能用“一刀割掉狗尾巴”的办法“一步到位”。只能用“爬楼梯”办法稳步推进，不能一步登天。发展不可急于求成，改革也不可急于求成。有人一见改革中出现了矛盾，就说这是改革不彻底、改革不配套、改革不完善造成的。这说明我们并没有明确肯定改革的过渡阶段，也没有按照改革过渡阶段的矛盾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致引出两个矛盾：在经济运行上表现为“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怪圈；在改革运行上表现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这两个怪圈的主要表现：

一、总量失衡反复出现，而且愈演愈烈，频率加快，震幅加大，造成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以致经济运行效益低下。

二、结构失调反复出现，而且愈演愈烈，频率加快，震幅加大。结构失调造成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结构失调造成流动资金严重浪费。目前国有固定资产约2万亿元，占用流动资金竟达1.4万亿元。这种比例是世界上少有的。

三、经济秩序混乱，在经济领域产生腐败现象，导致社会

腐败现象滋生。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既受到某些平均主义倾向的冲击，更受到分配不公的腐蚀。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收入大量流失（估算10年中有2000亿元），化为小集团和少数私人的收入，肥了少数靠非法所得起家的私有者。

“一步到位”的改革主张，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追求。改革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在改革过渡阶段，首要的头等大事是选准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呢？

1989年6月9日，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重申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路线，重申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目标模式。重申这个改革目标模式，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一是重申计划经济，明确拒绝以市场化作为改革取向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主张。因为这种主张不只是否定了产品计划经济模式（这是对的），也否定了商品计划经济目标模式（这就错了），要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而单凭自发的市场调节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不能确保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种改革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重申市场调节，明确拒绝以计划化作为改革取向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的主张。因为这种主张否定了市场调节，重走产品计划经济模式的老路。

二、改革过渡阶段的战略选择

改革的取向，即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之后，改革能不能顺利推进则取决于改革战略的选择。

（一）从微观经济层次取得突破的改革战略

中国改革的起始阶段，选择了从微观经济层次取得突破的改革战略。这个改革战略的选择，来自群众的创造。这是中国

城乡改革起始阶段走群众路线的一大特色。

第一步，农民出于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自发要求突破那种服从产品计划经济模式需要的集体经济模式。这种集体经济模式，接受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包括播种的土地面积，农作物品种，统派购数量和价格，都服从国家产品分配的需要，接受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完全排斥集体经济单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农村集体经济单位为了严格执行这种过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在农村集体经济单位内部也相应配套实行过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包括对社员农户实行统一生产、统一派工、统一分配的体制。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过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派生的农业集体经济模式，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民脱贫致富愿望的尽快实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声春雷，反映了农民多年的内心要求，先是个别省份的农民，而后是全国各地农村的农民先后实行联产承包制，国家相应采取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减少统派购品种、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等改革措施。接着，又根据农业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客观需要，鼓励发展集体经济力量，并以集体经济为经营实体，组织社会化的生产经营服务体系，把农户分散的生产联结为社会化大生产。这是农村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功。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乡镇企业。这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看来，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从农户联产承包制起步，是改革起始阶段改革战略的成功选择。

第二步，中国城市改革也首先从微观经济层次取得突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手脚被产品计划经济模式捆绑得死死的。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生产经营的供、产、销和人、财、物权，控制在国家手里。在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

既无经营自主权，也不用自负盈亏，没有生机活力。所以，城市改革的起始阶段，首先给国有企业松绑，松开产品计划经济模式给国有企业加的种种绳索。怎样满足国有企业的松绑要求？让群众自己动手闹改革，他们走“包字进城”的路。国家又从宏观上为国有企业提供形成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条件——减少指令性计划，放开一部分商品价格，扩大企业再生产领域的市场调节范围。从城市改革起步来评价，这是正确的路子。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的路子——利润承包制——利改税——利润承包制。现在企业改革要发展，要深化，要从经营责任制发展到探索全民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股份制。至于股份制与承包制的关系，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股份制是资产组织形式，是所有者的产权关系；承包制是经营者同所有者的关系，两者可以结合，不能互相取代。另一种意见，主张以股份制代替经营承包制。

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过程，有探索，有曲折，但是，总的评价应当肯定改革是成功的。探索是必要的，花点学费也是值得的。

（二）改革产品计划经济模式的改革战略

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解放出来。因此，企业改革的延伸，就是要改革产品计划经济模式本身。1983年决定改革计划管理体制。这是中国改革战略第二次成功的选择，尽管这次改革阻力过大，没有坚持下去，但是这个正确的改革战略选择应当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三）市场突破的中国改革战略

中国改革战略的第三次选择是在以市场化为改革的取向的